

贵州方志

文萃

主编 肖先治



贵州方志文萃

主编 肖先治

副主编 张桂江

罗再麟

编辑 卢光勋

伍启林

《贵州方志文萃》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名：贵州方志文萃

作者：肖先治、张桂江、罗再麟、卢光勋、伍启林

出版时间：2001年1月

印制时间：2001年1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立朴**

封面设计 **罗再麟**

技术设计 **卢光勋**

新
玉
林
志
文
革

《贵州方志文萃》

肖先治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黔欣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400千字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221—02491X/K·105 定价6.70元

贵州人民出版社

志改刊贵州界本集文本套。同时纂修新志则志书原产地贵州
真言利实深浅出类又出，新丁为一端果真深浅出类言事工

序。但新修文集工中至古志改修新志以学义主理
新尚得其真性，因原前文出下出，即一南西固脉长此限良
皆述成真，井底无史记之有，其时所用者是深合真意。新丁云
丰富改真而山湖内大工。表计的文集象新育真一志式谱奇缺
身的补正脉文史通入深官。光风小山阳美介麻源深然自任富
草也。

《贵州方志》创刊10年来，在指导新地方志编纂、旧地方志整理和贵州史料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刊物发表的500多万字各类文章中精选出79篇荟萃而成的这本集子，有贵州知名学者和专家有关方志的重要论著；有广大方志工作者根据自己实践体会写出来的力作。《贵州方志文萃》反映了10年来贵州方志学术研究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就。

10年前我受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委托，主持贵州修志工作。贵州历史上虽然修过400多部志书，现在也还有200多部流传下来。但解放以来没有编修新志，有的市、县由于设置较晚，历史上也从来未创修志乘。在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体例和方法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方面更缺乏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贵州发起创修新志之初，只有少数学者和热心修志事业的人士进行探讨。10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省数千方志工作者的刻苦钻研、辛勤笔耕，新方志已成批定稿出版。

地方志是我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宋元以来，为适应方志编修的需要，历代不断进行方志理论研究，方志学术理论发展成为我国一门重要的传统学科。随着我省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全面展开，方志从业人员结合修志实践学习继承历代编修方志的体例和方法，学习各省区修志先进经验，认真研究贵州的地理特点、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探索，形成了具有

贵州乡土气息的志书风格和编纂体例。这本文集不仅是贵州方志工作者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报，也反映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我省方志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一隅，由于历史的原因，外界对贵州尚缺乏了解。正确地介绍贵州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成为我省编修新方志一项有特殊意义的任务。处于浅内陆山区的贵州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山水风光，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淳朴的民族风情，各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人物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作出过卓越贡献，运用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体例记载贵州的历史变革成为10年来方志研究和讨论的中心课题，这本书中的不少文章是具有真知灼见的。

今后10年贵州各级新方志将陆续定稿出版，编辑这本文集的目的在于总结过去10年贵州方志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回顾10年来贵州修志过程，“温故而知新”，以进一步繁荣方志学术研究，这对于提高本省志书编纂质量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值本书出版之际，略贅数语，是为序。

1991年9月

目 录

(1) 贵州省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8)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15) 贵安吴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22) 望云采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29) 忠荣源	... 周少文交阳志宇
(36) 遵义古	... 郭宗首县里要遵义志书
(43) 谱录文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序 (50) 陈其南	... 秦天真 (1)
(58) 工 民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为编好贵州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而努力	... 秦天真 (1)
要认真把贵州省的地方志工作做好	... 王虎文 (14)
略论地方史志的重要意义	... 周春元 (19)
刘知己及其史学理论	... 张振佩 (26)
方志刍议	... 王燕玉 (37)
对民族地区修志工作的几点建议	... 张正东 (51)
关于修志指导思想	... 张向阳 (59)
编写人物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	... 肖先治 (67)
略谈方志的性质、特点及其纂修	... 史继忠 (76)
地方志是一部科学文献	... 陈梧山 (84)
新地理志的分类及内容	... 熊书益 (89)
地方志的科学性思想性及其功能	... 袁沉颖 (96)
新编方志与体制改革	... 柴松明 (101)
系统论与地方志	... 刘昕 (108)
浅议修志工作者的历史时代感	... 范同寿 艾松 (118)
发扬优良传统 编修新型方志	... 张新民 (124)
(138) 地	... 周春元主编秦天真总主编
城市志概论	... 张桂江 (134)
地区志专志编写刍议	... 幸必达 (146)

县志怎样体现整体性和科学性	张光伟	(154)
县志总纂及篇目探讨	石运中	(158)
县志篇目结构	吴守业	(162)
县志的叙事地域范围	梁云星	(165)
专志间的交叉处理	邓荣忠	(169)
方志总纂要坚持高标准	古开伦	(171)
反复修改 保证志书质量	安永新	(179)
修志行文八题	罗再麟	(188)
志稿总纂的资料处理与记述方法	吴 江	(192)
突出特点 反映时代精神	杨永富	(196)
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在方志中的反映	李本良	(199)
新方志主题的提炼	邱德林	(201)
方志美学刍议	张安邦	(206)
县志编纂“两步走”与“一步走”的利弊	罗世斌	(210)
编写《贵州省大事记略》若干问题的探讨	陈集忍 邵 斌 王晓政	(212)
县志大事记应统一文风	伍启林	(227)
新地理志的纂修	邓永璋	(229)
县志地理志的编写	陈善坤	(233)
县志地理篇的编写	禹明先	(238)
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写自然地理	黄军育	(243)
民族志与各专业志的关系	王胜先	(247)
民族志三体辨析	吴佺新	(256)
县志民族篇的编写	杨义瑚	(258)
民族志表述问题	程新华	(262)
民族志中记述风俗习惯的一些问题	罗康隆	(265)
运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编写经济志	杨光华	(269)

县志农业篇(章)的编写	静晖	(273)
名产志的编写	卢光勋	(276)
编纂财政志的几个观念问题	徐家麟	(283)
各级金融志的分工与联系	钱存浩	(287)
编好商业志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唐载阳	(291)
提高方志政治志质量	任贵明	(295)
重大运动如何入志	李祖炎	(299)
方志中政治运动编写问题	姚敦睦	(303)
政治类专志志名小议	王羊勺	(313)
新方志中应当设妇女专志	熊玉瑛	(318)
政权志的编写	王景春	(321)
军事志事类区分	钱秉孝	(330)
公安志篇目设计	蒋文武	(336)
法院志的编写	温杰	(340)
司法志的编写	陈代清	(347)
县志民政篇的编写	杨军昌	(350)
关于科技志“概述”	吴学林	(354)
科技志要体现自身特点	马光亮	(358)
社会科学志的独立性与特殊性	熊宗仁	(363)
记述文物必须注重科学性	葛镇亚	(372)
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编修宗教志	张坦	(383)
方言流变与建置沿革	涂光禄	(386)
方言志的作用及新旧方言志的差异	李龙舟	(390)
《社会志》的“五性”	郭礼中	(394)
社会风土志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	华松林	(397)
人物志的“志体”与“本传”的写法问题	谢尊修	(401)
人物传的编写	王道文	(404)

精收资料问题	陈新生 (406)
专志的资料工作	杨祖恺 (412)
认真把握资料质量	夏鹤鸣 (417)
资料是编写好新志的基础	龙尚学 (423)
历史人口资料的使用问题	石开忠 (427)
利用外文资料为修志服务	孙元成 (430)
方志中的考证	张明宗 (432)
方志中的图和表	王少西 (434)

(816) ①羊王 《贵州省志》编纂委员会
 (818) 蔡玉娘 《志书文稿》组中志文稿
 (819) 龙凤呈祥 《贵州省志》对页

附录

对编纂《贵州省志》体例的初步意见	(438)
关于编纂《贵州省志》的几点建议	(445)
《贵州省志》编纂方案	(450)
贵州省地方志“七五”时期编纂规划及	
《贵州省志》修正篇目	(457)
(321) 林华昊	“贵州”边文中关
(328) 梁长喜	林林良自取中夏志文稿
(333) 吴宗甫	王经春已逝立此清志羊来会旨
(338) 严菊英	当华泽重治原志科文稿
(343) 任一鸿	志殊宗翰辞长辞公服婚烟婚烟文主会形用
(348) 罗长东	革董置董包支系告衣
(353) 刘武率	吴基如志首式即豫又用前初选首式
(358) 陈邦源	“道武”朝“若圣长”
(363) 林谷华	系吴朝洪源举召男崇志士机会长
(368) 钱尊博	属同去志首“耕本”且“耕志”始志种入
(373) 文致玉	吾象柳南志首人

为编好贵州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而努力

——在贵州省第一次地方志编纂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秦天真

同志们：

我们今天在贵阳召开贵州省第一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省、地（州）、县（市）的几百位同志聚集一堂，商讨开展贵州的修志工作，计划写出各级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这是贵州各族人民的大事。省委、省人民政府、省顾问委员会、省人大、省政协的领导同志都出席大会，说明省的领导是很重视地方志的，并相信我们，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要勇于承担这项新的而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任务。

由于当前的大好形势为修志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我们开这样一个全省规模的修志工作会议，将会产生深远的、良好的影响。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四化建设稳步前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取得了成就。贵州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今年农业生产预计将超过建国以来的历史水平，工业继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社会秩序安定，城乡市场繁荣。这就为“盛世修志”提供了保证，也对修志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全国已经有18个省（区）和1000多个县市建立起修志机构，有的已经编印出首批专志，做出了示范。我们贵州是1980年12月成立筹备组，3年以来，作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已有

30多个州市县建立了组织，开始搜集资料，有的已开始试写，赤水、兴义已列入全国第一批出版65部县志的计划，但我们还是筹备的形式，就不能适应了。根据省委、省政府决定，在11月25日成立了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了推动和促进省级的30几个专志组和全省的三分之二的县市抓紧时机建立组织，开展工作，并加强已经建立了机构的县市组织，写好志书，因此，我们在年终这样紧要的时机，开这次全省规模的大会。会期不长，希望到会同志聚精会神开好这次大会。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老教授、老作家、老编辑和对地方史志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有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还聘请了一些省内各方面从事专业研究的知名人士担任顾问。下一步还要聘请一批熟悉专业情况、有文史知识的同志担任特约编辑或特约撰稿人。前人要求从事编史修志的人要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我们的修志队伍也应当有这样的要求。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要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这样的修志干部，才肯献身于贵州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不朽事业。

过去任可澄主持修纂的一部700万字的通志，花二三十年的时间。现在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写的新方志，对时限和字数，全国有一个大体统一的规定：一般要求省志7至10年编完，不得超过1000万字；市志5至7年编完，以三五百万字为宜；县志3至5年编完，以三五十万字为度。现代科学发达，知识广博，新兴事业日新月异，部类繁多，靠一人或少数人修志，毕竟知识有局限，不够应付和处理这许多问题，面对着内容这样丰富的现实，时间又这样紧迫，要保质保量的写好志书，就一定要按“众手修志”的精神办事，根据统一的指导思想、体例要求和“管什么，编什么”的原则，由各个部门、单位分头去写。必须依靠各级党政领导，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依靠一个精干的修志班子，齐心协力，才能把省志、县志、市志和一些地州

志写好。可以说，我们的这次大会也就是一个号召全省修志的动员大会，要求各地参与修志的同志，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修志的重要意义，大家一致团结起来担负这项光荣的任务。

下面我谈四个问题。

一、我们为什么要修志

中外民族凡是可用文字符号记事的，都记下了自己的历史，也都记载兴衰成败，教育后代。我国唐朝的魏征说过：“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即是说，拿人来作一面镜子，可以知道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拿历史来作一面镜子，可以知道兴旺或衰败的道理。过去的统治阶级规定各省、府、州、县修志，现在全国留下的各地志书有8000多部，贵州建省比较晚，也有300多部。这些志书里面记载有各种各样的史实，有的还是很难得的资料。清代道光年间郑珍、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农桑篇》，记载了山东人陈玉鑒做遵义太守引种山东柞蚕到遵义放种，浙江人徐阶平做正安吏目引种桑蚕的事，现在都很有取益之处。所以说旧志应该算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旧志的糟粕也不少，只要经过鉴别整理后还是有用处的。

中央领导同志从来就很重视地方志，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提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这时，国务院科学院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当时有的省如湖南、四川等就已开始编修新志。这个工作在10年动乱中中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提起修志的事，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这个工作。胡乔木同志说：“各地的地方志，过去不同时期，不同的统治阶级，都做过一些工作，现在在无产阶级

领导下，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多，更好，更科学，不应把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手里中断，如果中断了，后人就会很困难。”确实如此，从民国以来这70多年中，我省的修志工作没有认真的进行，基本上是中断了。而恰恰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也不例外地在不断的变化和前进。我们不妨上溯到16世纪初王阳明被贬到修文时，从他写的《瘗旅文》中描绘的贵州景况来看看。他说“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他以歌当哭地说：“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诅咒这个令人畏而却步的蛮荒之地。后来又有人编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谣，描写贵州的贫穷落后。直到今天，还有不了解地理情况和不大过问政治变化的人说“贵州是云南的那个贵州”，简直把贵州看成是异俗殊方之地了。旧社会的贵州确实是贫穷落后，贵州人民在明清王朝残酷的封建统治下，几百年来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咸丰、同治年间，各地相继发生的抗暴斗争以及太平天国在贵州的活动，影响都很深远。这些斗争，遭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人民颠沛流离，依然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解放前，甲秀楼边树立的铁柱，就是清王朝镇压贵州各族人民的罪恶证据。抗日战争时期有名的黔东事件，也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民国以来，连年军阀内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哀鸿遍野”、“子室九空”、“民不聊生”、“饿殍载道”这些词句，都可以用来刻画当年贵州人民的生活惨状。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思想传进贵州，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先是要求民主与科学，后来读了马列主义的革命书刊，思想有了新的觉悟，就要求变革社会，许多有志之士离开贵州追求真理。邓恩铭、旷继勋、龙大道、周逸群、王若飞等革命先烈，先后在祖国的大地上流血牺牲，他们的行动促进了贵州人民的觉

悟。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经历60多个县，传播了革命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前仆后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省干部、军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逐步改变了贵州贫穷落后的面貌。举几个我们平常亲身感受的事例来说。贵州人民的食盐，过去都是操纵在豪商手里，市场价格由他们控制，“斗米斤盐”，人们经常受到淡食的威胁。现在盐仓装得满满的，吃盐已经不是什么令人担心的问题了。过去用的煤油，全靠从外国进口，帝国主义各国和官僚资本互相勾结，为了分割贵州市场，各自在煤油中掺入不同颜色，作为标记，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销售。旧社会，粮价操在米商手里，一天几变。加之国民党统治下是“匪如梳，兵如篦，团甲犹如刀子剃”的惨状，农民大部分日子只得吃糠咽菜。解放以来，我们保证了粮食的正常供应，价格稳定合理，在连年农业丰收的情况下，农村家给户足，虽然我们还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但比起解放前，已经好得太多了。拿卫生条件来说，几千年来得瘴疠疟疾，基本消除。过去闹什么“鸡窝寒”、“霍乱”，那种全家全村死于瘟疫的悲惨情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以来，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从工交财贸各方面的成就来说，四条铁路通过贵州，公路遍布城乡，现代化的工厂触目皆是，水利电力建设走进了全国的先进行列，煤、磷、铝、锰和其他矿藏绝大多数是解放后逐渐发现并进行开采。广大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村里有单车、收音机、缝纫机、电视机的人户逐渐增多。还有我们的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拿旧中国档案文书的记载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了多么惊人的发展。我们只要看看这样巨大的变化，还能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吗？当然，不能再这样说了。

周总理来贵州时，评价贵州是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民勤劳。这是对贵州人民的勉励，贵州人民也应该珍惜这块好山好水的土地，努力建设新贵州。我们应该大书特书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成就，回顾过去，瞻望未来。这些具体事例的新旧对比，会对我们青少年一代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我们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将系统地、全面地记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各项建设事业施政规划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通过搜集和储存文献，为编写国史提供基础资料；作为乡土教材，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这也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有说服力的教育；通过修志还可以提高干部业务水平，培养一批熟悉情况、胜任工作的干部。这些就是我们编写新志的目的和意义。

二、修志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上面谈了修志的重要意义，认识了当前编修地方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还必须明确：要修一部什么样的新方志；修志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肯定地说，我们是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不能含糊的。历代修志都有它的指导思想，从明清两代贵州的若干部志书来看，地方官总有一篇修志序言写在前面，他是站在统治者立场对这部志书的编修意义和方法表明态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明他们的指导思想。有的提出要把皇帝的指示“恭录敬冠卷首”，由此可见他们的观点是那样鲜明。我们修新志也应该鲜明地揭示我们的观点，那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写新方志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必须体现在整个修志的实践活动中。为此，需要进一步阐明几个问题：

（一）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宪法》还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上面这一段话对我们修志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详细占有资料，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大量的材料中对旧中国的历史和新中国的成就作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这才是修志的基本态度，还要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正确对待历次政治运动。

(二)新编地方志要详近略远，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现实的情况和历史经验。长远的历史事件可供借鉴，近代的许多历史事件更有参考价值。贵州的鬼方、夜郎、牂牁等问题需要专家们继续探索研究；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战争等问题，要本着“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研究方法，把近百年的，或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史志写好。举个例说，红军过贵州、贵州的解放、贵州的土改、工商业改造等历史上巨大变化的事实，至今还没有一份系统扼要的材料或图书出版。必须有了货真价实的资料，才有所依据，说明问题，这种志书才会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资料，这样才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的要求。

(三)关于创新问题，要提倡在批判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创新，这里有一个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理论问题。方志一定要创新，才能容纳得了当代丰富多彩的现实内容；方志也要批判继承前人长期修志的遗产和经验，古为今用，如果否定前人的成果和社会贡献，就会使历史成为无源之流，那是错误的。

(四)新方志要突出贵州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贵州今天在全国的地位来说是很重要的，地处山区，煤、铝、汞、锰、磷等矿产极为丰富。河流落差大，适于发展水电。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多种经营，能为轻工业提供原料。激湍之下有深潭，高丘之下有峡谷，溶洞遍地，气候温和，给旅游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县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受人重视的东西，要把这些记载下来，反映出来。我们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过去贵州的少数民族是被反动统治者歧视压迫的。解放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少数民族建立了自治州、县，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才，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被介绍出国，受到国际的重视。旧志书上把少数民族列入《蛮夷志》，现在我们要专立一本《民族志》。民族的特点不仅反映在《民族志》中，还要反映在全志的各个有关篇目中，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发挥地方优势和加强民族团结。

(五)贯彻《邓小平文选》精神，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它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我们修志工作告一段落，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转折时期。就以贵州来说，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大，这段历史一定要正确反映在志书上。因此，要求大家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作为认识和编写当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指针。

指导思想明确了，认识统一了，才能写出符合客观历史真实，达到党和人民要求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志书，对四化建设才有用处。